

彭树智教授与中东史研究

张倩红¹, 张少华²

(1. 郑州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2. 河南大学 犹太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彭树智先生是我国中东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在地区史、国别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他对中东史研究的贡献: 引领学术前沿; 建树“文明交往论”; 注重学科建设; 富有学术情怀。

关键词: 彭树智; 中东史研究; 文明交往; 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702(2010)05-0053-06

长期以来, 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是国外学术界的热点。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发展很快。彭树智先生作为我国中东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深刻的思想见解、扎实的治学功底, 从民族主义思潮史、政治史、文化史、地区史、国别史等多角度展开多层次的研究, 成果丰硕, 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一、引领学术前沿

彭树智先生出生于1931年, 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家庭状况使他很早就对生活、社会、历史有了自己的思考。怀着浓挚的求学兴趣, 彭先生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刻苦学习, 勤于钻研, 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彭树智先生从北京大学亚洲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回到母校西北大学工作。不久, 随着政治运动全面开展, 学术研究被打入冷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科学的春天来临, 彭树智先生也赢来了自己的学术黄金期。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两个邻邦的战争引起了彭树智先生的注意, 阿富汗问题从此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彭树智先生充分认识到阿富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东国家, 是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 “它四面受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 时而是游牧世界的火光, 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化的火炬, 时而是希腊

文化的阳光, 时而是印度文化的星光, 还夹杂着中国文化的余晖, 这许多文化的光芒, 都先后在阿富汗闪烁, 并经过它不断打开古代闭塞之路。”^[1]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 阿富汗在近代走向了衰落, 但阿富汗历史是中东民族国家艰难历程的缩影。彭树智先生首先把近代阿富汗的政治变迁作为自己的科研出发点。1980年, 他发表了《阿富汗第一次抗英的历史意义》^[2]、《1841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3]、《阿富汗第二次独立战争百年祭》^[4]。随后几年又相继发表了《阿富汗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塔尔齐》^[5]、《青年阿富汗派的历史作用》^[6]等, 这些文章把阿富汗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第一次呈现给中国读者, 也推动了中国学界对阿富汗研究的进一步拓展。1993年, 彭树智先生出版了《阿富汗史》^[7], 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阿富汗的学术著作, 涉及了阿富汗从远古时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进程。1999年, 彭树智先生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完成了《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8]。《阿富汗卷》的独特之处在于, 从历史交往的角度来考察阿富汗的社会演变, 不仅描述了阿富汗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 分析其复杂的民族构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 而且特别关注了阿富汗在世界文明交往中的特殊地位, 探讨了原始宗教、祆教、希腊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阿富汗的碰撞、交流与融

收稿日期: 2010-09-12

作者简介: 张倩红(1964-), 女, 河南灵宝人, 郑州大学教授, 历史学博士, 从事犹太史、以色列史研究。

张少华, 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2008级研究生。

合。彭先生认为阿富汗文明与东西方文明的交往充分体现了文明发展的多元共存的特点,本土文明吸收了新的血液,外来文明趋向于本土化。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东历史的最持久、最深刻的因素之一,也是改变中东格局的主要力量。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环境中独特的历史根源与现实表现。彭树智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以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为宏观视野,梳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构建民族认同方面的所起的作用。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彭树智先生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上。

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的关注在20世纪初就已开始,对凯末尔的评价也经历了一波三折。早在1923年,柳克述就发表了《东方国家恢复国权之先例》^[9]一文,并于1926年出版了《新土耳其》^[10]一书,对凯末尔革命和改革进行了详细论述和比较研究,肯定了凯末尔的贡献。1942年,边理庭出版了《新土耳其建国史》^[11],对凯末尔的改革同样持肯定态度。后来,由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非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前途的,凯末尔革命也被描述成一次“失败的革命”。从此,学术界对凯末尔的评价转为否定,许多学者发表文章,讨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凯末尔革命的局限性^[12],大多数教科书也都持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初期,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仍没有得到我国史学界的普遍认可¹,直到1981年彭树智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凯末尔与凯末尔主义》一文,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文首先分析了一战后土耳其的社会危机,指出凯末尔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把握住了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凯末尔本人的政治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文章还着重分析了凯末尔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内涵实质,所得出的结论是: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进行适应现代社会改革的进步思想体系,是符合土耳其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在此论文的基础上,彭树智先生又陆续发表了《凯末尔的改革》^[13]、《论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14]等文章。彭树智先生指出,凯末尔改革开创了亚非史上民族革命和现代化改革的先例,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彭树智先生

的上述文章意义非常重大,彻底扭转了学术界对凯末尔主义及凯末尔改革的评价,此后发表、出版的关于土耳其的论著中都沿用了他的观点。不仅如此,彭树智先生也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从而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后来,彭先生在回顾这一过程时指出:“在未弄清史实、内涵及国情的情况下,有关书文即对凯末尔主义予以教条主义的批判。这种不恰当处理政治与史学关系的情况,使史学失去了自己的本体地位。”^[15]

中东地区历来是冲突与战争的策源地,20世纪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时候,中东地区仍然战火不断。彭树智先生一直关注战争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关联性。他认为,战争并不总是和文明对立,而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交往的形式之一,或者说战争是“以军事语言表达了政治需要”。战争无疑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与痛苦,但是战争的作用是多重的。他进一步指出:“战争在深远地影响着历史,它是历史季节的标志,它时而在打开,又时而在关闭着历史时间的大门。它和人类的历史进程如影随形,表面上好像消失但实际上依然存在。”^[16]²⁰⁰在中东历史上,我们会反复看到战争的结果与过程无不与文化交往密切相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阿富汗作为东西方陆路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的枢纽,战争作为一种政治交往形式往往与文化交往交织在一起。在周边大国的争夺战中,阿富汗是战场,同时又是文化交往的舞台。“早期的袄教化、希腊化、佛教化、伊斯兰化,以及近现代以来的欧化、苏化和当前的伊斯兰复兴,都反复说明了文化交往是伴随政治交往而来的深远变化。”^[8]³⁵²发生于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战是中国与阿拉伯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其结果是唐军大败。其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代外)基本对中东地区处于防御性的守势状态,但也正是在怛逻斯之战后,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西亚,后来又传到欧洲,同时,中国也出现了第一本记载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生活的汉文书籍《经行记》,成为后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当然,多方面地探讨战争的后果,并不等于为战争开脱罪责。面对

¹ 1960年彭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作用的文章,其中就涉及到对凯末尔革命的评价问题。作者认为,硬要把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多彩的现实,填压在中国革命模式的单一框架中去是不符合现实的,但此观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思考,反而遭到批判。参见彭树智:《土耳其研究三题》,《亚非论坛》2002年第1期。

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争端与冲突, 彭树智先生一再呼吁和解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 “要谴责暴力, 剥夺暴力的合理性, 停止一切暴力冲突”, “互唱互合的文明交往之歌, 如春江之水, 柔能克刚”。^{[17]369}

二、建构“文明交往论”

综观后冷战时代以来的世界学术发展史, 不难看出, “文明”成了最热门的语汇之一。

彭树智先生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 逐渐地认识到人类的交往活动是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纬线, 如果把交往与人类生产活动的纵向经线结合起来考察历史发展的进程, 就会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的客观面貌¹。后来, 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关于交往的论述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交往问题的讨论, 并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切身体会, 逐步厘定了“文明交往论”的内涵。一方面, 通过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事件来印证、充实这一历史哲学概念, 同时又运用这一理论来开阔史学研究的视野, 多元化地去探寻世界历史演变的轨迹。彭先生认为, 历史交往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个人、团体、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物质文明交往和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18]410}。换句话说, 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可分为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 这些内容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方位的和普遍性的社会联系。

文明交往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方式, 它不断消灭人类的孤立与封闭状态, 不断强化人的社会联系和世界的整体化进程。正是基于对历史交往的社会历史意义的高度认识, 彭树智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人类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问题。它在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中居重要地位。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是人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轴线”^{[18]485}。在彭树智先生看来, 过去研究人类历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 而是从理论层面思考不够, 仅仅局限于对多种交流活动的白描或考证。他还把文明交往论归结为“文明自觉论”, 即由自发向自觉性的演变, 在趋向上日益摆脱野蛮而逐步文明化; 在发展上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 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

家、地区走向世界; 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 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 由对立、对抗走向合作与对话。

彭树智先生对交往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他的《文明交往论》一书中。全书分为总论与分论两个部分。总论部分汇集了作者对于文明交往论的理论思考, 分论则选择世界历史尤其是中东历史中的一些典型个案来进一步阐释他的思想。

在对阿拉伯历史的探讨中, 他认为由于历史交往的普遍性, 决定了阿拉伯史研究要体现“综合性”特征。具体说来, 就是要利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种方法对阿拉伯地区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综合考察, 以阿拉伯地区为中心, 有联系、有区别地处理好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关系, 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联系, 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 这样才能找出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在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上, 彭先生认为, 过去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所持的文化形态史观的一般哲学取向已经不适应了, 应当从社会形态史观的社会学取向出发, 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为视角, 来考察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斯兰世界, 尤其要注重从纵横两条主线上来观察伊斯兰教与社会变革之间那种极其微妙的依存关系。纵线是伊斯兰教的变迁, 横线是中东现代化进程, 其间是政治、社会、人口、文化、国际交往等非经济因素和经济、资源、技术等网络线索的交织。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 伊斯兰社会贯穿了许多伟大的文明交往, 伊斯兰教正是在交往之中不断变迁, 现代化事业正是在交往之中曲折演进。彭树智先生特别强调, 伊斯兰教正是长期历史交往的直接结果, 伊斯兰教兼容的深义性与边义性文化传统则是思想文化交往的典型产物。正是在历史交往的实践活动中, 伊斯兰教表现出了它固有的凝聚力与感召力, 阿拉伯民族也正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 完成了空前性的世界性的历史交往活动。

在分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时, 彭树智先生认为, 阿以和平进程是当代历史交往中最复杂、最漫长的典型案例, 它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 又涉及阿以双方以及外部势力的利益、意愿、信任程度及干预力度。在各方和解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协

¹ 国内史学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已故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彭树智先生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苦苦探索, 系统并深化了这一观点, 并把“文明交往论”作为一种集哲学、历史学、文化形态学、社会学于一体的综合历史观来探讨一系列典型的历史个案。

议与备忘录的签署并不说明和平的到来。因此,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逐步追求的目标,进程本身比最终目标更为现实,应该从历史交往中估量其发展的阶段性。彭树智先生把犹太哲学家布伯的对话主义与社会本体论称之为“希伯来精神在交往理性上的再现”。他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文中写道:冲突虽是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严重通病,但也表现出人们从困扰和损失中挣脱困境的努力。“那种认为宗教冲突不能谈判、不能和解的观点,是不符合多元文明共存的文明交往规律的。世俗性的和宗教性的冲突,同和解总是伴随在一个共同交往过程之中。人类文明交往史证明:无冲突便无和解,无和解难以化解冲突。冲突之车运行有其惯性,和解刹车需要时间。勇气、智慧和理性是通向和解之桥。巴以冲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广阔思考空间的不同文明的交往个案,对它进行追踪研究,可以从中获取解决冲突问题的规律性的启示。”^{[8]484}

三、注重学科建设

彭树智先生一向注重学科建设。1986年西北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博士学位获得授权点以后,彭先生把中东史学科建设正式提上了日程,“为了加强学科建设……中东史的通史编著和研究被列为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19]并一再强调学人“自应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书写好、改好……学术史告诉我们:学要薪传,一代代接力向前;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总之,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们应当努力,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学界之林。”^[19]

彭树智先生先后主持出版了《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20]、《阿拉伯国家简史》^[21]、《二十世纪中东史》^[22]、《阿富汗史》、《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23]等多部教材,被多所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用书,为中东史学科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二十世纪中东史》是中东地区史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五个时期,论述了20世纪以来中东社会历史进程,对中东现代和当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介绍。《阿拉伯国家简史》论述了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状,力图用全局观点阐释阿拉伯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及发展规律,又以各国的特殊风貌来丰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内容。该书对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主义、现代化进程都有详细的论述。《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以中东地区固有的宗教文化地域特点为背景,系

统地考察了伊斯兰教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变迁及影响,探讨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就传统与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

为了适应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彭树智先生与他的学术团队,潜心耕耘,十年一剑(1997-2007),推出了他的“跨世纪”的力作——《中东国家通史》,为我国中东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东国家通史》全书共13卷本,每卷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群组成,共计378万字。全书采用历史的叙事方式,由古及今地阐释现有中东边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发展过程。重点是不同人群如何在交往中加强联系,最终形成文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往和彼此影响的历史。《中东国家通史》的出版,与以往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探讨中东地区的一般发展模式与共有特征的地区史研究相比,揭示了不同国家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弥补了“大地区史”的缺陷。我们知道,史学研究的通常方式是从特殊个案到一般共性,从国别史到地区史。地区史研究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国别史的研究,而且通过对某一个国家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大地区史”的缺陷,还能为地区史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对各国通史的撰述,最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学术群体的研究水平。其作用具体表现为:国别史研究能使我们从各国的国情出发,获得系统、全面、深入和厚重的历史知识,避免“地区中心史观”的偏差;能使我们有关国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内在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有系统理解,对于时空的变迁和世代的兴衰更替有理性的认识,从而为地区史研究打下更厚实的基础。《中东国家通史》依照国家通史的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各卷自成一体,又互为联系。通过对不同国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扫描,“扩展对中东地区的视野,丰富中东史的内容,活跃和深化对有关中东史许多问题的思考。入史的众多事实和历史细节,也是增强厚重的历史感、正确认识中东历史和做出科学评价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24]5}。马克思曾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代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得到的。”^{[25]450}《中东国家通史》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小历史”与“大历史”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中东国家的独特风貌,勾画了中东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因而成为奠定我国中东史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四、富有学术情怀

史学情怀向来是个宽泛的概念。中东地区扑朔迷离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边界矛盾的交织使中东史研究体现了更为复杂的认同差异与价值分歧,这就更加要求史学家具有超越偏见、求同存异的宽广情怀,而彭树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即具有学术洞见又不乏学术情怀的智者。

第一,对研究对象的深切同情。国学大师陈寅恪曾以“了解之同情”的名言抒发对学术研究的见解。中东史研究则更需要对研究对象的真同情、真热爱,也只有倾注了情感与心血的学术成果,才能更具感染力,也更富审美情趣;但同时又需要一种摆脱种族偏见、宗教偏见与文化偏见的普遍价值观,这样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客观、更为真实。彭先生多次指出,动荡与暴力冲突是中东大地生灵涂炭的根源,只有和平才是中东人民的福祉。在“民族和宗教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历史上的积淀因素,其中不乏交往活动中诸多负面遗留,但最重要的和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是西方殖民体系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殖民政策或加深、或引发、或制造了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了西方列强维持中东霸权的手段”^{[16]251}。在矛盾即已存在的情况下,彭先生认为中东国家要特别警惕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的发展,呼吁以理性、积极、务实的心态对待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彭先生对文明交往理论的阐释以及在该理论指导下对中东地区多种历史个案的研究,无不体现出一种向善的历史观,一种圣洁、博爱的和平主义情怀。

第二,立足现实的强烈使命感。我国的中东研究依然存在着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脱离,出现了历史研究低估现状研究,而现状分析又忽略历史探源的现象。彭树智先生一向主张学术研究应注意从通识、综合、比较等不同层面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这既是整体史观的表现,也会使历史具有现实的鲜活感,使现实具有历史的凝重感。正如他在《中东国家通史》的卷首叙意中所指出的:“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双向考察与反思,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注重‘关照现实’与‘反思历史’的一致性。”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从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是紧密关注一个又一个的现实问题。彭树智先生在《二十世纪中东史》、《伊斯兰教与现代化进程》、《阿拉伯国家通史》等一系列著述中,深入探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总结其经

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上述论著从社会形态史观的社会学取向出发,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为视角,一一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个案,重点描述了不同国家政治模式的确立与演变,经济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以及国民文化建设的不同道路,突出了以色列、埃及、约旦、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也门等国的现代化特征。同时,也关注了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在处理伊斯兰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

彭树智先生强调中东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现实。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了保证我国对外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加强我国同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交往,必须准确了解中东各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动向,对中东地区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重大事件具有预见性,及时作出符合实际的反映。”^{[26]298}彭先生的学术研究,注重为我国制定中东政策及进一步发展同中东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特别强调要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提供经验或教训。在文化建设问题上,彭先生认为,中东国家与中国都要面对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它要求其他民族接受这种文化,而不是平等的交往关系。所谓‘西化’就是西方文化‘化掉’东方文化的民族特性,使其失掉民族精神,从而沦为无根感、无方向感的‘文化殖民地’。”^{[16]95}因此,盲目自大和一味西化都是要不得的,国人在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时,要着力传承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特色,保留我们的民族个性。

第三,保持宁静的心态。彭先生多次强调,做学问的前提是要静心,要保持内心深处的一份宁静。文革期间,当学术成为禁区,彭先生却独走蹊径,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系统研读马列原著,不同寻常的毅力与坚守使他没有荒废人生中十分特殊的十年,相继出版了《叛徒考茨基》^[27]、《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28]、《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29]等著作。

对于当今社会所弥漫的浮躁之风,彭先生十分忧心,他提出了做学问的“四不”——勉励弟子:“一不为了拿奖而研究;二不为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而放弃研究;三不会因为失败而放弃研究;四不因为无好评而灰心”^{[16]272}。当《中东国家通史》被西北大学列入211课题之时,彭先生已到了“坐六望七”的高龄,也充分认识到了承担这一课题的困难与艰辛,但

先生学志犹在,追求未了,给自己立下了“入地狱,写中东史”的誓言。总之,每每读起彭先生书写的文

字,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参考文献:

- [1] 彭树智. 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J]. 历史研究, 1994(2): 133
- [2] 彭树智. 阿富汗第一次抗英的历史意义[J]. 人文杂志, 1980(3).
- [3] 彭树智. 1841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J], 百科知识, 1980(3).
- [4] 彭树智. 阿富汗第二次独立战争百年祭[J]. 西北大学学报, 1980(4).
- [5] 彭树智. 阿富汗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塔尔齐[J]. 河南师大学报, 1982(4).
- [6] 彭树智. 青年阿富汗派的历史作用[J]. 历史研究, 1983(4).
- [7] 彭树智. 阿富汗史[M].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3
- [8] 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9] 柳克述. 东方国家恢复国权之先例[J]. 东方杂志, 1928, 25(26).
- [10] 柳克述. 新土耳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 [11] 边理庭. 新土耳其建国史[M]. 重庆: 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2
- [12] 卢孔德. 从基马尔革命看资产阶级独立革命的前途[J]. 云南大学学报, 1981(3): 6
- [13] 彭树智. 凯末尔的改革[J]. 历史教学, 1983(5).
- [14] 彭树智. 论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J]. 史学月刊, 1987(4).
- [15] 彭树智. 土耳其研究三题[J]. 西亚非洲, 2002(1).
- [16] 彭树智. 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5.
- [17] 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M]. 编后记.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8]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 [19] 彭树智. 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 西北大学学报, 1999, 29(1): 32
- [20] 彭树智. 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 [21] 彭树智. 阿拉伯国家简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 [22]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 [23] 彭树智.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 [24] 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5]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26] 彭树智. 书路鸿踪录[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 [27] 彭树智. 叛徒考茨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2.
- [28] 彭树智.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29] 彭树智. 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Professor PENG Shuzhi and Middle East History Research

ZHANG Qianhong¹, ZHANG Shaohua²

(1.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Henan, China;

2. The 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PENG Shuzhi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studies of Middle East history in China, and h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gional history, national history and special history.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ies of the Middle East history are in four aspects: leading the academic front, 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The emphasis on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his strong academic passion.

Key words: PENG Shuzhi; Middle East History research; civilization interaction; subject construction